# 学科建设：市场与宏观调控『一个都不能少』

■本报记者 袁一雪

新冠肺炎疫情从暴发到被有效抑制，公共卫生学也历经被人“无视”到“重视”的过程。

比如，在疫情吃紧的2月份，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黄奇帆就曾建议教育部要鼓励“双一流”大学设立高质量的公共卫生学院，同时建设国家重点的单体公共卫生与防疫大学，如“中国公共卫生大学”，从而培养专项人才。

其实，经此一“疫”，被人刮目相看的不只是公共卫生学，还有一些基础学科也被重新加以认识。在全国两会举行期间，我们不妨听听代表委员们如何看待这一问题。

## “小众”学科并不存在

知乎有个主题是“为何生化环材是四大天坑”的帖子。“生化环材”分别指的是生物、化学、环境学和材料学。有知乎网友以生化环材与计算机行业内待遇的中位数进行对比，“可以说同样学历毕业生中，计算机的中位数达到化学的三倍是不成问题的”。

显然，在选择专业时，待遇、未来发展前景都是人们考虑的因素，但是一个专业的重要性却不能仅凭这两点来判断。

在此次疫情中，生物学是研发病毒检测试剂盒的中坚力量；化学则是“杀死”病毒最好的帮手；在此次疫情中发挥重要作用的体温筛查，以及医护人员口罩、防护服的提供，都离不开材料学；至于环境学，不论有无疫情，都与人类的健康生活息息相关。

因此，在全国人大代表、临沂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王学斌看来，所谓的“小众”学科并不存在，“我不认为这些学科没有被重视，而是由于社会需求和科学研究、学科教育之间的衔接没有做好，致使公众缺乏必要的常识性知识，在疫情发生后就表现得不知所措”。

他认为，如果要解决这一问题，首先不应局限于加强这些学科专业人才的培养，而是还要将其中一些内容作为高校的通识课程，让所有学生有所认识和了解。同时，在日常的公共宣传中，也应该加强这方面知识的普及，“就像几十年前我们宣传‘家家爱清洁，人人讲卫生’一样，在社会上形成预防疫情发生的整体氛围”。

全国人大代表、电子科技大学信息医学研究中心主任圣德中则认为，此次疫情对生物医学工程提出了新要求：“消毒机器人、取样机器人、化验结果自动分析……如果有这些装备，会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也能减少医务人员与患者接触时产生的风险。然而，我国生物医学工程学的发展还很不理想，一些重要的医疗设备仍主要依赖于进口。”

当外部环境出现变化，进口难以补缺时，一些问题渐渐凸显。因此，即便回家一再强调基础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但学科建设仅仅只是高校问题吗？

## 学科建设不只是高校问题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科学院院士段树民认为，学科建设是高校的问题，但又不是高校仅凭一己之力就能解决的。如果想要发展公共卫生学、医学、生物学等学科，还需要从社会需求、政府资金投入等方面着眼。

以医学为例，“这次暴露出的问题不仅仅是公共卫生学科和体系建设的问题，而是从医院系统运作到医科生培养等全方位的问题。”段树民告诉《中国科学报》。

在此次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召开之前，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王辰在委员通道谈到了医学教育要“灿烂其职业前景，严格其培养过程”，即要先让人们看到作为医生的灿烂前景，才能吸引优秀的人才成为医生，进而在培养过程中严格要求。

然而，目前紧张的医患关系、过长的工作时间等，让一些人在选择医学专业时踌躇不前。艾瑞深中国校友会网的调查报告显示，1977年~2016年中国大陆各地区省级高考状元中仅仅1.31%选择了学医，2016年大陆22个省份的36位“状元”中，更是无一人选择医学。

“在国外都是最优秀的学生学医，但国内不是。这不是一个原因造成的，而是一系列问题的后果。”段树民解释说。首先，医学生的学制很长：医学生本科阶段就需要五年，接下来还有“5+3+X”规范化培训、专科医生培训等。段树民直言，医学生如果本、硕、博都读完，再加上规范化培训、专科培训，即使一路顺利也要历经16年~18年才能正式开始工作，而做到主任医师等受人尊敬的职位还需要更多时间。

王学斌认为，针对疫情，适当调整学科布局和课程内容是必要的，但不能仅仅基于疫情已经造成的严重后果才被动地去应付。

“非典疫情已经给了我们机会，但是我们没有抓住。国家曾拨大量款项研究SARS病毒，但这项科研工作进展有限，且其中一些工作是重复的。而且，随着SARS病毒消失，仅围绕该病毒进行研究意义不大。”王学斌说。

在他看来，“调整学科和专业设置，应更多考虑未来再次发生疫情的可能性及应对办法，加强对疫情预测、走向的判断，大数据分析和应急处理等方面的人才培养，而不仅仅是针对此次新冠肺炎病毒”。

## 民生保障型专业应由政府兜底

要解决这一问题，政府宏观调控必不可少。圣德中认为，有些学科的发展可由市场需求决定，比如计算机与通信技术、人工智能等，“而像公共卫生等基础学科属于维护国民健康的保障型专业，不会像计算机技术那样拥有大量的市场需求。因此，国家应考虑增加对相关学科及其工作岗位的保障，由政府兜底”。

他同时表示，虽然目前一些学科的地位因为此次疫情而有所提升，但这一变化不是持久性、根本性的变化，而只是阶段性、跳跃性的变化。“如果国家足够重视，日常做好科普工作，让更多百姓了解诸如公共卫生体系和传染病医院的作用，对于相关学科发展和队伍建设将会是持久而根本性的促进。”

“此外，精神卫生专业机构也应该被当成专业公共卫生机构来建设，并加大投入，包括基础设施、医疗装备和人力资源等。”圣德中告诉《中国科学报》，精神卫生问题不仅仅是医学问题，也是社会问题和国家脑力资源问题。

“此次疫情导致的心理卫生问题以及心理干预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各级政府应该把相关机构作为基本的民生事项抓实抓好，并正面宣传引导，让广大干部群众充分了解精神健康的重要性，及其对家庭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圣德中说。

王学斌则认为，目前学科专业过于细化，甚至走入极端。“有的研究者除了自己研究的方向，对周边一些常识性知识一无所知。”

他举例说，比如生物学领域，现在几乎是窝蜂地强调用分子的手段去做研究，而整体的宏观研究、传统的方法往往被打上“落后”“学术含量不高”等标签。

“但是，这种情况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搞植物学的认识不了几种植物，搞动物学的叫不出常见动物的名字，路越走越窄。因此，学科交叉、传统和现代结合、理论和实践真正打通，应是下一步人才培养努力的方向。”王学斌说。

代表委员热议

# “后疫情时代”的高等教育

蔓延至今的新冠肺炎疫情，让历史缓缓逼近了一个十字路口，也让它对于当下及未来的影响，成为今年全国两会上讨论的重要议题，高教领域亦是如此。

2020年年初到现在，新冠肺炎疫情让我国乃至全球高校都脱离了常规的教学、科研轨道。其间，一些在疫情之前看似“非主流”的学科、教学模式、研发机制，如公共卫生学、在线教学、产学研协同等，因其在抗疫中的不可或缺性，反而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弥补这些短板，并由此激发新思路，对于一个人的成长乃至国家的发展，均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

对于高等教育而言，疫情改变了什么？“后疫情时代”我们应关注什么？带着这些问题，本报记者在两会期间采访了诸多代表委员，以期展望未来的高等教育走向。

# 教学模式：“危”“机”触发教育生态改革

■本报记者 陈彬 王之康

对于我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史来说，2020年的上半年是值得铭记的。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迫使国内几乎所有高校都开启了一场从未有过的从线下教育到线上教育的大规模探索。

如今，这场探索已经持续数月，学生们也已经“适应”了每天在电脑屏幕前见证老师们如何在线上教学从“新鲜感”走向“常常态”的重要节点。对于这一轮教学变革如何评价？未来其将走向何方？这些问题成为此次全国两会上委员们热议的话题。

## “线上教育”≠“线上”传统教育

在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大学校长李清泉看来，此次由于疫情而导致的教育模式改革，虽然看似一场“遭遇战”，但其实是多年以来，我国高等教育在线上教育领域的探索的阶段性。

“这次大规模线上教学的开展，得益于近几年国内高课的建设和积累。”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李清泉表示，在教育部的统筹下，我国仅首批建设的37个慕课平台就提供了4.1万门慕课供全国高校免费开放。从这个意义上说，慕课建设为这次大规模线上教学提供了坚实基础和保障。

我国高校的线上课程积累从2004年开始。“从国家精品课程建设到国家精品视频公开课、精品资源共享课，到中国大学慕课，以及现在的在线开放课程，多阶段的建设为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建立了若干个在线课程平台。”受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副校长施大宁也坦言。

“疫情发生之前，对于将信息化手段渗透到教学过程，广大老师和学校的积极性，创造性都还有些滞后。疫情的暴发，反而成为线上教学巨大的外部推力。”在施大宁看来，这表明，“就高等教育教学管理和教育模式转变而言，此次疫情是‘危中有机’的。”施大宁说。

然而，与此同时，此次疫情也暴露了目前国内线上教育所存在的某些问题和不足。

李清泉在受访时直言，从目前来看，我国现有的慕课资源远不能满足大规模需要，部分教师对信息化教学手段的需要正在倒逼高校、政府以及社会共同出需要一个过程。“此外，我们还应倡导高校教学模式的多样化创新，以满足学生多样化和个性化的教学需求。”

采访中，对于线上教育教学手段革新问题，很多代表委员各有提及。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大学教授李晓明表示，线上教学与课堂教学有很大不同。实施好在线教学，不仅需要流畅的通信平台，更需要优质的数字资源和灵活的教学组织。不过，在他看来，目前在线教学的短板并不是这些，而是教师如何适应这种新形式，调整自己的教学设计。“教学设计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它不是信息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教育技术问题。”

对此，施大宁也表示，目前课堂教学的信息化过程还是基于传统的知识传递、知识传授，而在实践性教学、能力培养，以及从多维度对学生进行真实情景教学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

“因此，借助此次疫情，我们确实应加大信息化教学改革的力度，推动知识传递从面对面教育转向网络化教育，从而切实拓展课堂的空间。”施大宁说。

## 在线教育重“教”更重“管”

谈及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对于线上教育的最大影响，李晓明笑称是让那些曾经保守、对线上教学有成见的人，看到了“线上教学也还行”，而不再是听到“线上教学”就反射性地说“线下课堂不可替代”了。

虽然明确了线下教育可以替代，但如何管理好线上教育尚待探讨。

李晓明表示，此次大规模的线上教学实践，对于运用信息化手段推动教育教学方式改革具有革命性意义，应该乘势而上。不过，现在高校要更加关注的是，“在线教学到底怎么样”，即实实在在地评估这一学期在线教学的效果，并对教学管理方面进行更多思考。

在他看来，教学管理大致可分为过程管理和结果管理两方面。当前高校在传统课堂条件下，过程管理的核心往往是一张课表，教师和学生都提此在相同的时间、地点上课，迟到、早退者都可以同责；结果管理则主要体现在学生成绩和学生评教上。

“从技术上讲，目前比较切实可行的在线教学管理方式是运用课程管理系统（LMS）。经过多年的研发和应用，该系统已经相当成熟，不仅支持结果管理，也支持过程管理。”李晓明说。

对此，施大宁表示，通过各种手段，我们已可以在线上便捷地将知识传递给学生。很多人也习惯性地将此理解成“线上教学”，但这其实是一个误解。“这只是线上教学的一个初级阶段。真正的线上教学不仅仅是教，更重要的是管理。”

以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为例，在线上教学中，该校建立了自己的教学管理平台。所有课程都必须要在管理平台上建课。“通过管理平台，我们能够实现对教师资源的调控，对教学效果的监控，以及对每门课学生参与度的把控。”施大宁说，在此基础上，校方还可以通过大数据分析和存储，形成对整个教学过程的管理，从而“既有监控手段，也有评价手段，还有优化手段”。

“这一体系我总结为‘1+N’模式。其中的‘1’是教学管理，要实现对学生‘不散养’；‘N’则是信息传递。按照这一模式运行，学校、教师和学生可以处于同一个平台，从而形成管理的闭环。”施大宁说。

## 混合式教学将成更大挑战

眼下，新冠肺炎疫情在国内得到了很好的控制。随着各高校学生陆续返校，距离结束大规模网上教学也为时不远了。此时，更需要考虑的一个问题是，“后疫情时代”，线上教学将何去何从？

“作为一种教学方式，线上教学不可能整个高等教育，单纯的线上教学也很难培养具有人文情怀以及适应社会发展要求的创新型人才。因此，当疫情过后，学生肯定还要回到课堂。”施大宁表示，将来的教育一定是线上与线下教育相结合，也就是所谓的混合型教学方式。而在全分分秒秒攻关科研难题的队伍中，不乏高校的身影。

它们用实际行动一次次证明了自己的社会使命，这其中，科学研究成为了高校完成这一使命的重要途径。

这是否意味着，此次疫情也是高校科研与国民经济和产业发展加速融合的一个契机？

## 不能为了布局而跟风布局

“此前，我们一直强调高校科研要服务于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但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在于，高校科研还要服务于国家重大突发事件。”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四川大学校长李言荣如此表示。

李言荣强调，相较于重大战略需求，重大突发事件由于其本身的性质，对相关机构的应对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这十分考验高校的综合实力，尤其是基础研究的实力”。

受访时，很多代表委员都提到了基础研究对于提升高校服务科研能力的作用。全国政协委员、东北大学校长赵继直言，如何通过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使高校在创新能力建设上，形成自身独有的优势和特色，这是目前高校必须要考虑的一个问题。

“疫情期间，我们看到的一个现象是，许多高校都在面向疫情进行科研布局，这当然是很重要的。”赵继表示，但也一定要注意，这样的布局要基于校本身的学科特点，不能为了布局而跟风布局。

以东北大学为例，在学科设置上，该校并没有专门的医学学科设置，但疫情期间，东大本身的研发团队和东大孵化的上市企业东软却在移动检测设备等方面作出了很大贡献。

“人工智能和新医科结合，将成为我们未来应对突发性事件时提前布局的一个方向。”赵继特别强调，要知道自己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不能到处“铺摊子”，必须有明确的定位并作出实事求是的选择，扬长避短，找准自己的位置，突出自身的优势特色。

除此之外，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高校还要注意将自身融入整个社会的联动链条之中。

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钟章队坦言，在应对突发事件时，高校所起到的主要还是“积极配合”的作用，在这方面，低估或者高估自己的能力都是不恰当的。

“当疫情暴发时，不要说某一所学校，即便是一座城市，一个省份，在应对疫情时都显得力不从心。”钟章队说，最终我们能够协制疾病的蔓延，靠的依然是全社会的整体联动。

他坦言，相对于社会整体而言，高校还是一个功能比较单一的机构，然而重大突发事件往往具有相当程度“社会化”属性。这就决定了高校应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力点，还是应该集中在自己的主业——人才培养上。换言之，高校提升应对重大突发事件能力的最重要途径，是能够培养出合格的相关人才。

“当灾难来临，你的人才培养是否能经受住考验；当灾难过去，你的人才培养又能否为将来可能的重大突发事件储备足够的智力资源，这是高校最应该注意的。”钟章队说。

## 科研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疫情期间，各高校纷纷加大相关的科研力度，但最终评判这些成果的优劣，靠的还是成果本身能否在抗疫过程中发挥实际作用。这让李言荣对于当下国内高校科研定位有了更深的思考：“通过疫情大家可以体会到，科研要做一些‘实在’的事情。”

他表示，高校科研的重点一方面要解决科学前沿问题，另一方面也要面向现实需求。“总之，要么‘顶天’，要么‘立地’，此前一些人游走于这两者中间，未来尊文章数量和专利申请数量文牍的科研，将愈发没有意义。”

赵继也表示，未来高校科研的确应该按照国家对人才和科技评价的新要求，突出对国家需求和区域发展所做贡献的考量。“比如，东北大学对东北振兴就承担着更大的科技和创新驱动的责任。在这方面，我们还在路上。”

对此，钟章队也有着自己的思考。

“我们当然要倡导高校科研工作有一个正确的导向，但单纯地强调‘顶天立地’却有些过于笼统。”他表示，当前高校不但数量众多，学校层次、定位和科研能力也有着很大区别，而在实际中，学校定位往往又决定了学者科研的定位。“基础研究到产业化的链条是很长的，每个学校都不可能单独解决链条上的所有问题。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的是某个高校或学者在科研产业链条上的定位，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确定学者的科研定位。”

事实上，多年来，我国高校的确存在着某些科研定位摇摆不定的问题——有时大力推行科研评定化，有时提倡基础研究的重要性，有时又鼓励高校进行长期性研究……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安工程大学校长高岭看来，这种摇摆不定本身就说明，用一把尺子定位所有高校的科研是非常困难的。

“具体而言，对于国内顶尖高校，无论是‘顶天’的原始创新，还是针对未来战略性的研究，都应该担负更大的责任。但对于以应用型本科高校为代表的一批学校而言，则更应该面向国家战略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战场，针对性地开展有应用意义的研究。”高岭说，当然这样的划分并不是绝对化的，但如果在宏观层面能有一个原则性划分，可能会使得每所高校在自身的科学发展中有更清晰的定位。

## 高校要将“接力棒”向前延伸

东北大学是一所以工科优势见长的大学，作为校长，赵继对于高校不能“包打”整条科技产业链的说法十分赞同。受访时，他做了一个“接力赛”的比喻。

“如果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过程比作一场接力赛的话，高校比较适合跑的是第一棒和第二棒，即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企业则应该完成最后一棒，即成果最后的产业化应用，其中的第三棒目前尚存在一定缺失和短板。”

“这缺失的第三棒便需是我们通常讲的产学研用协同创新。其本质便是，高校、科研机构的转移、成果转化，以及其他形式的智力支持。”赵继说，从性质上和长远的角度来说，这方面的工作本应交给企业完成，这也是国家一直强调企业是自主创新主体的重要原因，但目前国内有能力充分实现这一使命的企业数量还太少。这就要求高校将接力棒向前延伸。重要的是，要建立一整套新的机制和平台，包括协同创新、技术转移和中试，成果转化和利益分享、合作平台等。

“此外，有时我们也可以根据成果的不同形态，参考国外模式，在这场‘接力赛’中，吸引风险投资基金等第三方社会资本的参与。毕竟在成果转化的最后阶段，高校不善于具体组织产品生产，这是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相比之下，有些情况下，风险投资基金进入转化投资领域，不仅专业，对项目失败的承受力也更强。”赵继说。

对于第三方机构在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过程中所能发挥的作用，不同的代表委员有着不同的看法。钟章队在受访时直言，风投基金对于科技成果产业化所能产生的作用十分有限，其原因就在于风投基金有其自身的运作流程和价值判断标准，这样的标准不一定适合所有科研成果的转化。

对此，高岭表示，目前解决高校科研成果产业化难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具体的形式，而在于能否激发校企双方的成果转化积极性。

“在谈论如何进行科研成果转化之前，我们首先要正视另一个问题——我们不做产业化行不行？”高岭说，高校出于社会责任、自身的价值体现，以及客观的指标考核，对于成果转化的积极性相对更高，但企业优先考虑的是自身的生存以及运营成本问题，高风险的成果转化有时就不是企业谋求发展的“优先项”。在这种情况下，再去讨论转化方式的意义就不大了。

高岭表示，这提示我们，解决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的一个前提，是激发校企双方（尤其是企业）对于科技成果转化的内在动力。“这既涉及到观念的问题，也涉及企业效益问题，甚至是企业的考核和评价的问题。而当真正激发出双方的科技成果转化积极性后，具体的转化路径和方式问题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了解决。毕竟在这方面，我们的选择还是很多的。”

# 人才培养：多方面提升知行能力

■本报记者 温才妃

新冠疫情给我国乃至全球高等教育带来的影响重大，从长远来看，也对我国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提升学生面对人类灾难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其处理应急事件的能力等。

但无论要求如何，始终绕不开人才培养中的三个问题——“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也绕不开如何细化“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这样一个人才培养目标。对此，在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们有更进一步的见解。

## 增加劳动教育、实践教育

在抗击疫情中，“90后”冲在抗疫前线，发挥了生力军作用，但也发生了留学生发表不当言论的事件。同是青年人，为何思想上的差距如此之大？

全国政协委员、南通大学校长施卫东指出，青年大学生处于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形成期，既乐于接受新鲜事物，也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产生偏激的态度。“涵养大学生家国情怀，促进爱国主义成为大学生的坚定信念、精神力量和自觉行动刻不容缓。”

在他看来，当前爱国主义教育中主要存在以下问题：一是爱国主义教育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不紧，难以涵养家国情怀的根基；二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形态单一，没有唤醒或催生家国情怀成长；三是爱国主义教育的内涵亟待丰富，家国情怀缺少深厚的文化底蕴支撑。

家国情怀到底是什么？有人认为是形而上的东西，抽象的追逐目标，实际工作中难以做到。

全国人大代表、苏州大学校长熊思东指出，当国家、民族遇到了困难，哪怕是短暂的困难，以什么样的姿态来面对、用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行为来应对，就是人们常说的家国情怀的表现。

如何提升家国情怀？受访者均表示，要特别重视“五育”中德育的立德树人作用。道德情操在个人层面是品德修养，在国家层面即家国情怀。

但是，德育并不是孤立地发生作用的。在全国人大代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校长吴普特看来，疫情中不当言论的产生，与劳动教育的缺失也有一定关系，关键是当事人缺少感同身受的劳动体验。他进一步认为，劳动教育可以促进德育教育，进而提高学生的素质、修养。

他解释，一个人只有通过体验劳动的艰辛，了解流汗的过程，才能体悟到成果背后的付出，进而体会到国家发展所取得成就的来之不易，才会在社会生活中树洁吃苦耐劳精神、在劳动的实践中塑造自我，才能学会尊重他人的劳动成果、自觉关爱帮助他人，才会永怀爱国之心、身践强国之行。

对于劳动实践所发挥的教育作用，熊思东认为，改变课堂教育模式，将触角延伸至社会，把思想认识扎根在现实社会中，是一个很好的育人抓手。“过去我们脱鞋上有泥的教授就是好教授，但现在不能简单地说，鞋上有泥就的学生是好学生，必须脚踏国家、民族的大地接受知识、深研学问，才能成长为国家、民族所需要的有用人才。”

## 培养应对人类共同威胁的能力

在这场蔓延全球的疫情中，无论是国际视助，还是科学研究，始终夹杂着不和谐之音，但总体上体现出以人为本、休戚与共的国际合作精神。大学生怎样才能具备应对人类共同威胁的能力，是疫情向教育者提出的一个重要拷问。

吴普特指出，保护好地球、保护好人类家园，不仅仅是一国之事，还是全人类面临的问题，必须树立全球资源配置的概念，这也是全球化的应有之义。当下，粮食、公共卫生、生态环境等多领域都表现出全球资源配置的特征，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休戚相关。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当是高校在“后疫情时代”应进一步强化的人才培养理念。

事实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高等教育使命有着一致的追求。施卫东说，高校的科学研究、人才培养、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职能，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我们既要培育青年大学生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胸襟，又要使之成为当代大学生世界观、历史观与人生观中的有机成分。”

在熊思东看来，提高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的同时，必须重视应对国际范围内突发事件的能力培养。他指出，当下人才培养的问题——理论知识与实际应用有相当差距。“疫情给我们的一个反思是，人才培养既要使学生有良好的理论功底，更要强调学生的对应胜任能力”。他以管理人才为例，我国并不缺公共管理等方面的人才，但人才培养中一个共同缺陷是实践性不强。这次疫情让人们体会到专门的应急管理人员的不足。而如果有一支专门的应急管理队伍，遇到类似情况就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在施卫东看来，应对人类共同的威胁，还应该提升大学生的大局意识和团队协作能力。在加强理解与沟通的前提下求同存异，在相互理解的基础上取长补短，在相处中体现宽广的胸怀、深厚的文化底蕴，增进青少年信任、欣赏的合作观念，涵养青少年勇于担当的大局意识。

熊思东表示，人才培养还要有国际视野。如今高校都在推进国际化进程，但是否仍存在“隔靴搔痒”的现象，值得人们思考。如所培养的对外人才对国际规则并不熟悉、对各民族、各国的实际情况并不了解，“要改变走马观花式的‘引进来’，应真正在人才培养体系下更深入的功夫”。

## 慎待动物与加强健康教育

如何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此次疫情对于大学生而言是很好的“教材”，也是特殊的体验。

医学出身的熊思东分享了一组数据：上世纪70年代以来，几乎每年都有一个新现疾病出来，隔几年就会有一个再现疾病“卷土重来”。“再现疾病几乎100%与没有妥善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密切相关，新现疾病中80%都来源于动物。尊重人类和动物各自的生活空间、生活习惯和行为，是处理好人与自然界关系的重要准则。”

“我们要慎待动物，而不是善待动物。”熊思东曾与学生分享过这一观点。把动物从野外带回来进行人工饲养这样的行为，并不是“善待”的表现，“对待动物要有敬畏之心，要把握行为的尺度。人们要建立起人类只是自然界很小的一分子的概念，不能对自然界居高临下”。

施卫东表示，疫情再次提醒我们，认识、把握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的自然观，方能深刻理解“人因自然而生，人与自然是一种共生关系，对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的生态文明理念。

如何培养大学生的生态文明意识？施卫东认为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加强生态文明观念的教育，促使人们对生态环境的保护转化为自觉的行动，引导大学生们尊重自然、提高公民环保意识。二是加强生态法制教育，宣传环境保护知识和环境法规，提高大学生参与可持续发展的了解。

疫情期间，人们的目光聚焦卫生和健康领域。吴普特一直在思考，农业虽不直接与治疗疾病相关，但与公共卫生、人类健康有着莫大的关联，俗话说“病从口入”是有道理的。

吴普特指出，当前我国亚健康人群仍有70%左右，增强全民体质和促进重大公共卫生事件的应对能力，对伙食营养提出了更高要求，迫切需要发展“健康引领型农业”，使其成为人类最好的“医生”。健康引领型农业是指以药食同源理念为指导，在绿色农业基础上，生产对于亚健康功能因子、强化营养素的新型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生物产业。

通过此次疫情，加强人与自然的教育，涉农人才的培养更应实出加强健康教育。“在通识课程中，应加入健康教育课程。”吴普特说，如今定义的“健康”，并不是吃得饱、吃得好，高比例的人处于亚健康状态，说明人们的膳食不够科学。“下一步，我们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培养具有健康引领型能力和素养的涉农人才，支撑健康中国战略实施。”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3号 邮政编码：100190 新闻热线：010－62580699 广告发行：010－62580666 62580707 传真：010－62580899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海工商广登字20170236号 零售价：1.20元 年价：238元 工人日报社印刷厂印刷